

前言

貧困在日本以驚人的速度持續蔓延。它步步緊逼，當你意識到的時候恐怕已無法動彈。迄今為止，我已在書中用「下游老人」「貧困時代」等詞敲過警鐘。

本書所要講述的就是這樣不斷滲透蔓延到每代人中的貧困。老人、年輕人、孩子……不論男女，每代人都在貧困中掙扎。這樣的時代是史無前例的。正如本書的題目所言，當今社會正處於可以被稱為「貧困危機」的嚴峻態勢之中。

舉例來說，孩子的貧困是看不出來的。他們有文具，享受國家免除書費的政策，甚至還有手機，身上穿的衣服也並不破爛。儘管這樣，還是有孩子因為沒錢去上補習班而跟不上學習進度。一旦融不進朋友的圈子，孩子在學校裡就失去了立足之地，跟不上班級進度的孩子只能待在家裡，上網找人聊天。天黑了，用超市的熟食或是便利店的便當湊合當晚飯。在外兼職的母親很遲

才能回家，如果是在過去的年代，那時孩子早已進入夢鄉。母親兼職收入微薄，難以維持家用，多虧下班後超市食品區經常打折。成天忙於工作的母親，並不知道父母不在家的時候孩子在做些甚麼。於是，處境相同的孩子在外面一起玩到很晚也不會有人知道。長此以往，他們會以為自己是沒人關心的、彷彿不存在的人。

這樣的孩子在日本各地悄悄地生活着。

為了擺脫貧困，高中畢業後的年輕人選擇上大學，大學畢業後儘可能找一份穩定且薪資待遇優厚的工作。為了賺取學費以維持在校生活，他們一邊學習一邊兼職數份工作，從早忙到晚，幾乎沒有睡覺休息的時間，更不用說娛樂了。剛邁出學校的大門，還沒接受畢業的祝福，他們就已背負了有「獎學金」之美名的債務，從而不得不忍受黑心企業的壓榨，擔驚受怕、度日如年。身邊早已身心俱疲的公司前輩們，因忍受不了常年加班以及來自上司的壓力而紛紛辭職，下次可能就輪到自已了。他們憂心忡忡地試圖另找一份工作，卻發現無論到哪裡情況都差不多，根本無處可逃。

日本到處都有這樣因焦慮而幾近崩潰的年輕人。

日本各地被「若隱若現的貧困」籠罩着，讓人不知如何是好。有人說，東南亞地區仍有孩子生活在貧民窟裡，只能露宿街頭，與這些地方相比，日本還算富裕的國家。在此我要反對這種說法。在本書中我也會詳細講

到，貧困有「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之分。不得不露宿街頭的淒慘狀態，我們稱之為「絕對貧困」；與此不同，無法在健康、文明和「人」的需求上得到滿足的生活狀態，我們稱之為「相對貧困」。在日本，「相對貧困」正在不斷蔓延，從青年人，到年富力強的中年人、壯年人，再到老年人，不分男女。「雖然現在的生活還不富裕，但只要勤勤懇懇地工作，終將等到幸福的晚年」，一個失去了如是希望的社會，即便未達到絕對貧困，也是暴露在貧困危機之下、充滿壓力的社會。

以埼玉縣埼玉市為基地，我和非營利組織 hotplus 的夥伴們長期致力於組織並參加援助貧困戶的活動。15 年來，顯而易見的貧困人群——因過度體力勞動導致身體超負荷，被房東趕出公寓只能露宿街頭——早已銷聲匿跡了。這也與扶貧機構向他們提供臨時住所，以及網咖的全國普及有關。然而，無法客觀正視自己生活狀況的嚴峻性、跟誰都不商量而把自己逼上絕路的人卻有增加的趨勢。「不想承認自己是貧困者」的意識讓貧困更加難以被看到。幸而，hotplus 每年有超過 500 起諮詢案例，使作為援助者的我們能夠輕易看到貧困。我希望能把自己看到的貧困傳達給社會，哪怕是一小部分也好，讓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貧困危機的存在，並早日獲得應對貧困危機的能力。

言歸正題，本書第 1 章講 10 多歲到 20 多歲的年齡層所面臨的貧困。為甚麼年輕人進入公司才 3 年就辭職？為甚麼年輕人都不結婚？對長輩來說，現今的年輕人身上處處是難解之謎。第 1 章便客觀地講述了這些年輕人所處的狀況。

第 2 章講 40 多歲、支撐家計的中年人的勞苦。擔負家計的中年人被迫進行不合法的長期勞動，形勢嚴峻，而且那些無法承擔家計的「蝨居族」、「啃老族」和沒有工作的年輕人也正逐漸步入中年。在這樣的情況下，全家人都可能因貧困倒下。

第 3 章講女性所面臨的貧困。第 2 章所講的「中年人所面臨的貧困」沒有涉及女性的案例，這是因為中年男性與中年女性所面臨的貧困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其社會背景涉及從經濟高度成長期開始延續至今的男女工資差距。在終身雇傭制度崩潰的波瀾中，首當其衝的是那些靠獨自一人的力量生存的女性，包括單身母親。本章用較大篇幅講述了她們的情況。

第 4 章例舉了 65 歲以上老年人的貧困案例。向 hotplus 尋求幫助的人半數是年過花甲、無收入來源的老人。長壽反倒釀成了不可估量的悲劇，令人唏噓。

第 1 章到第 4 章的結尾處，作為「建議」，請允許我指出今後日本應有的走向。

第 5 章進一步總結了針對貧困現狀的具體對策。如

有正為生計發愁的讀者，請儘管從第 5 章開始閱讀。

若能通過本書，釐清日本人陷入終生貧困的背景和現狀，與讀者共同摸索使日本重獲新生的道路，也是一件幸事。

目錄

i 前言

第 1 章 年輕人的貧困

- 002 「你又不窮」，尋求幫助卻被言論攻擊的女高中生
- 004 「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
- 008 「貧困就該有貧困的樣子」的傲慢
- 009 貧困批判行為有甚麼問題
- 012 案例 1 「我也能高中畢業嗎？」——戴耳環金髮少年的迷茫
- 016 案例 2 入職無新人培訓的知名房地產公司營業部，筋疲力盡的 24 歲年輕人
- 017 「加油」，但即使被鼓勵也拿不出幹勁
- 020 責備無法忍耐的自己
- 021 甚麼都不懂的職員 —— 「您有可以依靠的家人麼？」
- 023 「公務員批判」使市民陷入困境

- 024 首例打工者起訴違法雇傭案，打工大學生被店長用菜刀要挾
- 025 把基幹工作推給非正式員工以提高利益的公司
- 027 勞動力市場道德水平下降
- 028 **案例 3** 「都是為了你好」，因遭受價值剝削而無法上學的專科學校學生
- 029 **案例 4** 不敢按時考勤的 25 歲廚師；職場是沒有牢門的監獄
- 030 價值神話在機器的齒輪之下是行不通的
-
- 033 **建議 1** 增設租房補貼等政策以減輕生活負擔！

第 2 章 中年人的貧困

- 040 「健康警察」的清除異己行為：需要人工透析治療是患者「自己造成的」
- 042 健康差距是日本的定時炸彈
- 043 **案例 1** 比起蔬菜優先選擇卡路里和飽腹感，38 歲得了糖尿病的快遞員
- 045 貧困和生活習慣病是雙刃劍
- 046 「幫助『真正』困難的人吧」是詭辯
- 047 《蠟筆小新》中的理想家庭；至今依然火熱的「中流」之夢
- 051 動畫片《海螺小姐》成為科幻片的那天
- 052 **案例 2** 高學歷處於社會底層，養家的 34 歲編輯律師夢碎

- 054 1000 萬人 40 多歲仍是非正式員工
- 056 向所有人悄然接近的貧困陰影
- 059 大叔在高速公路下過夜
- 061 **案例 3** 為贍養老人離職，住在地板殘破的獨戶住宅裡的 80 多歲母親和 50 多歲兒子雙雙倒下
- 064 **案例 4** 20 年「蟄居族」，50 多歲男子在其母親遺體旁向我們求助
- 067 300 萬？日本「蟄居族」人數眾多的原因
- 069 **建議 2** 援助從尋找生活窮困者開始

第 3 章 女性的貧困

- 076 經濟高度成長期後一直處於「貧困」狀態的女性
- 078 **案例 1** 在被雙親忽視下成長起來的 17 歲打工女高中生的未來
- 079 斬斷貧困的鎖鏈，關鍵是教育投資
- 080 窮途末路的單身母親
- 081 母子餓死在「經濟大國」
- 083 半數單身母親家庭的存款不到 50 萬日元
- 086 **案例 2** 被公司利用，40 歲單身母親的絕望
- 088 「你沒有加入工傷保險」是謊話，用《勞動基準法》武裝自己！
- 089 **案例 3** 為孩子的生命安全負責的 24 歲保育員，未來一片黑暗

- 092 提高工資，首先應提升該職業的社會聲譽
- 093 **案例 4 「我想上學」，等待改行機會的 28 歲護士靠風俗職業生存**
- 095 苦於生計，女大學生在風俗店兼職
- 097 工資微薄，單身女性隨年齡增長的不安
- 099 **案例 5 收銀 20 年，中年女子「總覺貧窮」的現實**
- 101 親子團聚忌談將來之事
- 102 最後的安全網；女性犯罪人數激增
- 104 **案例 6 獎學金償還中，年收入 200 萬日元女博士的夢想是「無任期專職」**
- 106 高學歷低收入人群急劇擴大引發學術界危機
- 107 被剝奪的寬裕生活，「房租重壓」下的人偶
- 110 **建議 3 以社會福利「去商品化」為目標**

第 4 章 老年人的貧困

- 117 **案例 1 被遺棄在公園裡的男性認知症患者「山田太郎」**
- 118 「棄老點」的衝擊
- 119 在令人雀躍的東京奧運會之後到來的「2025 問題」
- 124 「下游老人」數量持續上升的原因
- 126 **案例 2 「有 600 萬日元的積蓄還是難以安心」，照顧患認知症妻子的 78 歲男子**
- 130 援助越來越少，負擔越來越重

134 從藝人家屬領取最低生活保障金事件說起

136 **案例 3 接受最低生活保障後自殺的 72 歲老人**

138 用 10 萬日元的叩拜宣告終結的人生

140 救援不到位導致的更大災難

142 **案例 4 「在我死之前，請一直雇用我」，靠遺屬年金生活的 74 歲女性的祈禱**

144 **建議 4 職員都是社長，關注「協同勞動」！**

第 5 章 日本貧困生活 社會和個人所能採取的最好策略

149 **知識篇**

光是了解就能安心

149 關於日本的社會保障制度

149 (1) 社會保險

155 (2) 社會福利

157 (3) 公共扶助

165 幫助解決生活中各種困擾的「生活窮困者自立支援法」

166 民間以及半官半民 (NPO 等) 的援助制度和活動

170 **轉變態度篇**

現在不改變，問題就無法解決

170 放下驕傲，增強「受援力」！

171 帶薪休假吧

172 在生活被毀掉之前加入工會

- 174 準備分散風險的最佳時期是 40 多歲時
 - 176 培養權利意識，確認將來年金的金額
 - 177 選舉能改變甚麼
 - 178 為了 1500 日元的最低時薪，在選舉投票時發聲吧！
-
- 181 結語



第 1 章
年輕人的貧困

十幾歲輟學的孩子，剛邁入社會就背負了 300 萬日元貸款型獎學金的畢業生，被當作一次性勞力使用、二十幾歲就因病倒而失業的年輕人……「你們還年輕，隨時都可以重新開始」，這樣的看法還要持續多久？

本章認為年輕人的形象已經發生了改變，並回顧 1990 年代以來雇傭制度的崩潰在工作和人生觀上給 90 後年輕人帶來了何種影響。在經濟高度成長期間，團塊世代¹ 完成了財富累積。與有團塊世代支持的團塊二代² 相比，更年輕的幾代人可以說幾乎處於學校、企業和地方社會的邊緣，快要跌落。為了不讓這樣的危機再傳遞到下一代人，必須從年輕人出發，着手建立起讓日本重獲新生的計劃。

「你又不窮」， 尋求幫助卻被言論攻擊的女高中生

2016 年 8 月 18 日，日本 NHK 新聞播出了以「孩子面臨的貧困」為主題的節目。孩子們在節目中講述生活的窮困，節目組用攝像機記錄下他們家庭的情況作為

1 日本戰後第一次嬰兒潮（1947—1949）期間出生的日本人。（本書腳註都為編者註）

2 日本第二次嬰兒潮（1971—1974）期間出生的日本人。

佐證向觀眾進行介紹。

在名為「神奈川兒童貧困對策會議」的活動中，節目組在眾多參加活動的孩子中選了一位立志成為設計師的女高中生。女孩和母親兩人居住的公寓沒有空調。儘管學校有電腦課，但女孩並沒有電腦，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看起來非常簡樸的小型鍵盤，這是給女孩練習打字用的。由於經濟上的原因，女孩沒能進入繪畫專科學校上學。「看起來理所應當的事對有的孩子來說是可望不可及的。」女孩在演講中向觀眾如是傾訴，「明明有夢想，為甚麼我不能朝着夢想前進呢？」

每 6 人中有 1 人，這是厚生勞動省根據統計得出的達不到平均生活水平、處於貧困狀態的孩子的比例。女孩的母親不是正式員工，通過打零工來維持家用。本來，女孩所說的情況應該是誰都能夠理解的。然而，因為節目組偶然拍攝到了女孩房間內擺放的許多動漫周邊產品，以及一支價格不菲的用於畫插畫的筆，女孩的 Twitter 賬號被找到了。通過這個 Twitter 賬號，網友發現女孩吃了 1000 日元的午餐，去看了喜歡的電影。於是，女孩在網絡上變成了可怖言論的攻擊對象。

「你不是過着充滿文化氣息的生活麼？」

「一邊享受着電影和午餐一邊喊窮？需要幫助？別開玩笑了！」

「NHK 停止捏造！」

「說實話，不看稅單也不知道父母的收入是多少吧。這樣真的叫貧困麼？」

「反正局外人也不知道具體情況。你就騙人吧！」

一位國會議員發佈的 Twitter 使得事態進一步發酵。

「確實，你看起來過着簡樸的生活，但如果把吃午餐和看電影的錢節省下來，是不是就能買台電腦了呢？如果因為經濟上的原因沒有辦法進入理想的學校，別忘了還有獎學金制度。」

對於這段帶有揶揄意味的自言自語，有贊成和反對兩種意見。這件事甚至引發了反對貧困批判行為的街頭示威。在混亂之中，女孩關閉了 Twitter 賬號。

「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

僅為了維持生存已竭盡所能的極限生活狀態，我們稱之為「絕對貧困」，這可以說是只在亞洲、非洲等洲的發展中國家才能看到的現象。聯合國將其定義為收入低、營養不良、健康水平低、缺乏教育等「人」的基本需求無法得到滿足的極限生活狀態。

然而，即便有足夠的食物，有遮風避雨的住所，還是有人無法過上「人」的需求得到滿足的生活。這種情況被稱為「相對剝奪 (Relative Deprivation)」，1960 年代由英國社會學家彼得·湯森率先提出。彼得·湯森

提出了幾個指標，包括是否有冰箱、與他人是否保持着朋友關係、是否在教育上有所花費，甚至還包括是否在外吃飯、是否舉辦家庭聚會。那些抨擊女高中生的人看了這些指標可能又要大喊「別開玩笑了」。能舉辦家庭聚會說明這個人有朋友、有可以請朋友來的房子、有可以向朋友展示的聚會策劃方案和廚藝。如果一個國家的大多數國民不能指望享受這樣的生活，並且沒有向他們伸出援手的社會保障制度，那麼這樣的社會就算不上是富裕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不斷發展的英國被認為是消除了貧困的國家。而湯森則被認為是帶領人們重新認識了貧困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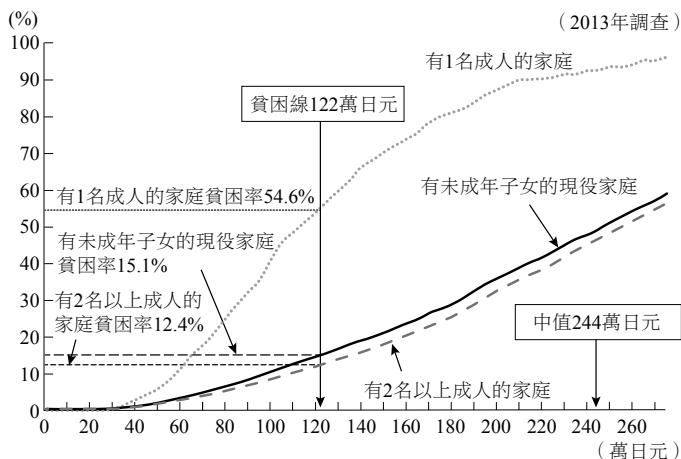
那麼，被言論攻擊的女孩到底是「貧困」，還是「只要節約一些就可以了」呢？有統計學上的方法可以辨別。

從家庭收入中扣除稅金和保險費等「非消費性支出」，所得收入是實際可以使用的「可支配收入」。將「可支配收入」除以家庭人數的平方根，得到的是「等價可支配收入」，這是能夠更貼近現實地反映各個家庭成員實際收入水平的數字。2012年，日本「等價可支配收入」的中值（將各個家庭的「等價可支配收入」從低到高進行排列，取中間位置的值）理論上達到244萬日元。收入達不到這個數值的一半，也就是達不到122萬日元

的人數所佔全體人口的比例為「相對貧困人口比例」。按照家庭成員人數來看，一人家庭年收入不滿 122 萬日元，二人家庭年收入不滿 170 萬日元，三人家庭年收入不滿 210 萬日元，四人家庭年收入不滿 245 萬日元的，被稱為相對貧困。

2012 年厚生勞動省國民生活基礎調查指出，日本相對貧困人口比例為 16.1%，是自 1985 年調查開始以來的最高值，同時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 34 個加盟國中為第六高數值 (2010 年)。

圖表 1-1 按家庭規模繪製的貧困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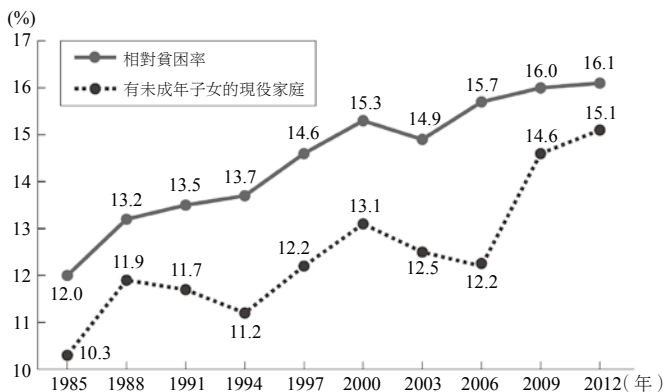
註：等價可支配收入為名義值；現役家庭為戶主年齡在 18 歲以上 65 歲以下的家庭 (譯者註)

出處：厚生勞動省《2013 年國民生活基礎調查概況》

當然，不知道明天會發生甚麼、與靠打零工維持家用的母親相依為命的女高中生，也是構成這個數值的其中一人。二人家庭年收入不滿 170 萬日元就屬於貧困線下，而達到這個數字對於獨自撫養孩子的單身母親來說是困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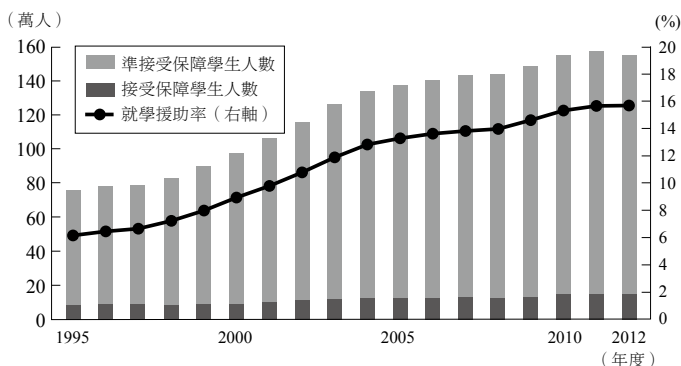
人們之所以看不到孩子們面臨的貧困，不正是因為「某某國家還有露宿街頭的流浪兒童呢」這種錯誤的比較方法將眼前的貧困抹去了嗎？而在日本，最忙於抹殺貧困的，是那些在社交網站上匿名對貧困進行言論攻擊的人。

圖表 1-2 相對貧困率的逐年變化



出處：厚生勞動省《2013 年國民生活基礎調查概況》

圖表 1-3 對小學生、初中生的入學援助情況



註：1.《學校教育法》第 19 條規定：「對於由於經濟原因入學困難的適齡兒童或適齡學生的監護人，市町村應當給予必要的援助。」對《最低生活保障法》第 6 條第 2 款規定的保障對象、市町村教委認定的生活貧困程度與保障對象相近者（準接受保障者）給予入學援助。

2. 這裡的就學援助率是指援助對象（接受保障學生人數和準接受保障學生人數總和）佔公立中小學學生總數的百分比。

出處：內閣府《2015 年兒童和青年白皮書（完整版）》

「貧困就該有貧困的樣子」的傲慢

因為貧困，所以不應該去看電影，不應該收集動漫周邊產品。有這種想法的人認為「絕對貧困」才需要被救助，並且無意識地抱有「窮人就該過苦日子」的懲罰態度。這種把窮人看作「劣等人」的傲慢態度，讓人聯想到 16 世紀以後在英國產生的窮人隔離思想以及強制將窮人收容到勞役場的行為。這裡我想簡單說明一下，在曾經的英國社會，「窮人就是罪惡」，窮人被比作「螞

蟻和蟋蟀」故事中好吃懶做的蟋蟀。即貧困是個人應該承擔的後果，應該用鞭子抽打懶惰的窮人，驅使窮人幹活，懲罰性地將他們強制送入收容所。貧困批判行為就是現代社會懲罰窮人的鞭子，不同的是看不到揮舞鞭子的人的臉，僅從這點來看，就比 16 世紀後的英國更為深刻。

先於「相對貧困」這個概念，《日本國憲法》第 25 條規定：「一切國民都享有維持最低限度的健康的、有文化的生活的權利。」儘管如此，與 2012 年最低生活保障批判事件相同的情形仍然再次上演。日本從來都沒有改變。

上述「神奈川兒童貧困對策會議」活動的主辦者，神奈川縣兒童家庭科科長小島厚在 BuzzFeed 的採訪中談道：「現在的孩子有智能手機，有衣服穿，溫飽上不存在問題。即便這樣仍然有不能去修學旅行，不能上大學，放棄未來的孩子。我們活動的目的就在於將這些難以被看到的貧困現象公之於眾。」

貧困批判行為有甚麼問題

女孩與母親相依為命的生活算不上「絕對貧困」，她們無需為衣食擔憂，但她們的生活經濟來源不充分，屬於「相對貧困」，一旦生病受傷、離職、工作單位破產，

便會立刻陷入窮困的境地。正因如此，我們更應該大力發現難以看到的「相對貧困」。

2012年，以藝人母親接受最低生活保障為發端的最低生活保障批判事件中，我們沒有把社會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準確傳達給大眾，造成了極端言論的產生。例如，在NPO法人hotplus收到的大量關於扶貧意見的書信中，有一位20多歲的男性寄來的一封信。

「窮人因為不努力才會貧窮，我不贊成拿我們的稅金去救助他們。這是令人難以容忍的事。適者生存，在每個人都努力生存的社會上，窮人顯然不是『適者』。」

明明我這麼努力地工作、納稅，這筆錢卻要用在懶人身上，這是難以容忍的。這位男性大概是出於這種想法才那樣說吧。窮人的存在讓自己吃了虧，字裡行間流露出繳納了不必要的稅款的受害者情緒。然而，寫這封批評信的人自己也有可能遇到生病、失業、陷入貧困的情況。在這種時候能夠讓人們互相幫助的，正是社會保障等互助制度。

進一步說，即使責備貧困的人，該繳的稅並不會減少。「勞動生產率低的人就該過節衣縮食的日子」，如果這種說法得到普遍認同，貧困者就會被貼上「二等公民」的標籤。窮人不該看電影，窮人不該買畫筆……這些細

微歧視的盛行最終會導致欺凌、曠課、吸毒、賣淫、家庭暴力、放棄（無視）育兒等被社會排除的行為；為了防止群集的反社會者中出現犯罪者，社會將變成監控型社會，人的住所被按照等級強制分隔開來。正如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所描寫的那樣，恐怖的反烏托邦社會將在 21 世紀誕生麼？

在被割裂的社會裡，人群不再流動，沒有持續發展的可能性，沒有希望。誰都不想被稱為「二等公民」，因而生活稍有貧困也強忍着，身體不舒服也勉強自己工作，而且不得不接受低水平工資。

貧困批判最終將導致以上所說社會的形成。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夠認識到言論攻擊對誰都沒有好處，並且在自己陷入貧困的時候能夠主動尋求社會制度的幫助。希望所有人都能不僅僅盯着眼前的利益，而是去想像無法估量的社會整體利益。

一位 20 多歲的男性在申請最低生活保障時，工作人員這樣安慰他：「請暫時接受最低生活保障，重整生活後再次出發吧。祝願你能早日開始工作。」聽了這番話，他流下淚來，說：「第一次有人對我說這麼溫暖的話。」

案例 1

「我也能高中畢業嗎？」——戴耳環金髮少年的迷茫

「這位男性是你的甚麼人呢？」

「……同伴。」

「同伴是指男朋友嗎？」

5 分鐘過去了，10 分鐘過去了，依然是一陣沉默。

少年沒有生氣，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你們住在一起吧？你有生活費嗎？」

「我們分着吃一份便當。」

自我表達對少年來說是困難的。聽者如果不進行話語誘導，就沒法知道少年想表達的意思。即使得到了他的回覆，不通過想像，也沒法理解他所講的意思。雖然對不起這位少年，但不得不說，他的言行讓人聯想到 3 歲幼兒。有些少年少女無法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想法，只能哭、扔東西，這其實也是向他人發出的求救信號。女孩常常會沉默不語，男孩則會把椅子踢飛。只要孩子到了 10 多歲，就足以釀成暴力事件。我們接到過為家庭暴力苦惱的父母以及孩子班主任的求助，為了保護孩子的家人，我們辦理了孩子的住院手續。hotplus 之所以會收到這樣的請求，是因為絕大多數這樣的家庭都有貧困的背景。

定時制高中不是為了在白天勤工儉學的學生設立

的，而是學習能力低下的孩子最後的收容所，這個安全網已經存在很久了。

在富裕的家庭裡，即便孩子學習跟不上，家長也可以聘請家庭教師，給孩子報私塾班補課，或者親自監督孩子學習。但如果一個家庭裡父母是非正式員工，抑或家長是拿不到撫養費的單身母親，孩子上學的選擇通常就只剩下公立的定時制高中以及較差的學校。首都圈內的學校有專門負責這類問題的社會工作者，他們有時會收到來自學生的求助。但如果孩子在地方學校上學，一旦遇到經濟或家庭上的困難，就很可能直接退學，甚至會出現退學學生人數比順利畢業學生人數更多的情況。

以下是在埼玉縣定時制高中上學的和田大（化名，17 歲）的案例。

和田大染一頭金髮，戴着耳環，一看就是正處於迷茫期的少年。這樣的孩子往往通過外表尋找同伴，組成小團體，就像一個微型社區，以此來學習為人處事的方法。但是和田不同，他不能夠理解他人的想法，自己的想法和主張卻是鮮明的，因此經常一言不合就對朋友和認識的人施以暴力。和田的班主任發現，這個孩子從小學至今，長期以來都以偷竊作為與人交流的方式，於是聯繫了 hotplus。面對這樣的學生，我們會向校方請求：「請不要將學生強行退學。學校的老師是學生最後

的後盾，請幫助他並隨時和我們聯繫。」於是，老師、學生、學生母親和社會工作者開始共同摸索幫助學生擺脫困境的辦法。

以和田為例，經醫療機構診斷，他患有發育障礙。這個類型的孩子可以通過在幼兒早期接受專門的治療和教育來學習如何與人相處。如果家長沒有儘早發現，孩子就錯失了早期治療的機會。和田的母親為了生活拚盡全力，除了平時上班做事務性工作，週末還有勞務派遣的工作，雖然也發覺孩子有些不正常，但實在沒有工夫認真對待。

回到空無一人的家裡時，有的孩子能夠理解母親不在家是在為自己打拚，而有的孩子則只會陷入寂寞，甚至離家出走。雖然對和田來說為時已晚，但幫助治療的精神科醫生、校內社會工作者和 hotplus 的工作人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填補了母親的缺席。和田的精神狀態漸漸平穩，4 個月過後，在一次談話中，他小聲自言自語道：「我也能高中畢業嗎？」

和田上的定時制高中需要讀滿 4 年才能畢業，如果有不合格的課程則需要更多時間。但他許下了願望，不管 4 年也好 5 年也好，都會堅持到高中畢業。這是因為他知道，閱讀、寫字、算術以及與人相處，是在社會上生存所需的最基本的能力。雖然不是每天都去學校，但他試着開始恢復上學了。

「對我來說甚麼都無所謂，就剩等死了。」

面對老師，他擺出強硬態度。這是一種可愛的試探行為，就像在母親面前撒嬌一樣，此時老師代替了母親的角色。像貓試探主人一樣，他在試探老師對他的容忍限度。

「為了增加您與孩子在家的相處時間，是否考慮一下減少您的工作量呢？」生活費上不夠的部分可以靠最低生活保障來補貼。但是，和田的母親不肯放下現在的工作，「現在辭職的話，以後就再也不能做事務性工作了」。失去工作的焦慮令她沒有辦法辭職。

最低生活保障是以現金或物資的形式，提供生活扶助、住房扶助、醫療扶助、教育扶助、護理扶助、喪葬扶助、職業扶助、生育扶助，從 8 個方面進行整合性扶助的「扶貧制度」(第 5 章進行詳細介紹)。也就是說，這是極其貧困的人才能得到救助的制度，對扶貧對象的要求很高，因此很難幫助人們重新開始生活。我想，如果只給跟不上進度的學生補貼上補習班的費用、手機等通信費用、買米的費用、房租等，將扶助形式分散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將多麼靈活易用啊！又有多少在貧困中掙扎的人能夠得到拯救呢？

我原本希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夠得到改善，卻得知以幫助最低生活保障接受者為工作的神奈川縣小原田市生活援助科的職員們，自掏腰包製作了印有「別小看

最低生活保障」字樣的夾克衫，並穿着這些夾克衫訪問最低生活保障接受者。

話題再回到和田身上。由於和田患有發育障礙，我建議他不僅應該讀完高中，學習閱讀、寫字、算術等技能，也需要在能夠發揮強硬性格之優勢的崗位上工作。在日本，即使是技術崗位也往往對禮儀和溝通能力有所要求，和田在找工作時首先會在這一環節碰壁。我希望和田能尋求職場適應援助者（job coach）的幫助，即使在技術崗位工作也能與他人進行基本的溝通交流。

案例 2

入職無新人培訓的知名房地產公司營業部， 筋疲力盡的 24 歲年輕人

2020 年東京奧運會臨近，房地產行業沸騰了。從名校畢業的應屆生若能進入房地產行業工作，可以說是前途無量了——他們的父母輩都是這麼想的吧。

吉田聰司（化名，24 歲）從名校畢業後立刻被分配到某知名住宅開發商的銷售部門，成為正式員工。銷售部門共有約 1000 名職員，工作環境嚴酷，不僅沒有相互鼓勵的政策，業績排名差的人甚至會面臨被辭退的風險。公司的前輩接連不斷地辭職，與之相對應的是，

年輕的吉田所擔負的建築及裝修方面的銷售指標不斷提高。進入公司的第二年，由於長時間勞動，吉田生病倒下了。

「和上個月相比，這個月業績太差了。」

「你沒能力。快辭職吧！」

即使被上司嚴厲指責，吉田仍強忍着堅持在崗位上。突然有一天，他在床上起不來了。吉田的老家在埼玉縣，位於首都圈內，他本可以回老家。然而，他選擇了打電話給 hotplus，理由是拖欠了房租，存款見底，到了進退兩難的境地。而他不回老家的原因是「父母也指責他不該請假」。

「加油」，但即使被鼓勵也拿不出幹勁

吉田的父母已經 50 多歲，他們不清楚現在年輕人的情況，所以才會指責孩子：「好不容易進了那麼好的公司，為甚麼不再努力一把呢？」才會說出：「我們這代人可是為了接單一天跑 100 家客戶，跑到鞋底都磨平了。那個成就感啊！」這樣一來，孩子肯定不願回老家。因為即使對父母傾訴在黑心企業遭受的殘酷待遇，這些話語也不會被傾聽。

從人口爆發式增長的 20 世紀 60 年代中期起，「努力的人都過上了好生活」的時代僅持續了 30 年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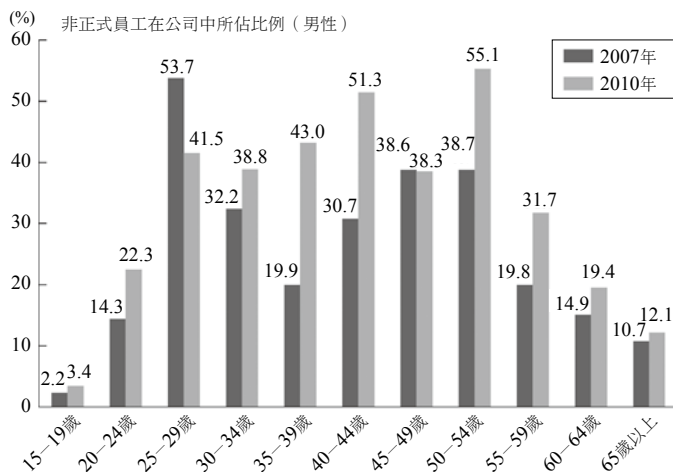
在日本，光靠丈夫的工資就能養活妻兒的經濟高度成長期，頂多持續到了 20 世紀 90 年代前期。那個時期的記憶和成功體驗，深深地刻入了父母輩的心靈和身體裡。現在看來，那明明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年代，但作為一個輝煌而又美麗的時期，似乎成了他們記憶中的「永恆」。

不能被父母理解是比貧困更痛苦的事。

做了這份工作後，我能看到過去政府採取了甚麼樣的政策造就了現在的日本，而現在的日本政府採取的政策將對未來 10 年產生甚麼樣的影響。父母輩之所以無法理解現在的時代，不僅僅因為他們總記得年輕時的美好。

首先，當時和現在的政府所採取的經濟政策完全不同。在經濟高度成長期，社會積累的財富被用於社會保障和社會投資。政府採取的經濟政策擴大了雇傭規模，提升了消費水平，促成了社會整體的良性循環。當時政府規模大，下有大量公務員，社會保障、醫療福祉預算充分，實施了老人免費看病、發放住房補貼等各類福利。然而在這樣的恩惠之下，日本人的壽命不斷延長，人口老齡化率不斷上升，社會福祉需要覆蓋的人群也不斷擴大。為了維持政府財政的穩定，英國的戴卓爾首相、美國的列根總統、日本的中曾根康弘首相，均採取了不再加強社會福祉的政策。

圖表 1-4 各年齡段「非自願非正式員工」調查情況



出處：厚生勞動省大臣官房統計情報部《就業形勢的多樣化相關綜合實態調查》

可以說，在日本，通過拚命勞動實現大量產出的經濟高度成長期已經無法複製了。20世紀90年代日本的少子老齡化阻礙了發展進程，企業紛紛出海，前首相小泉純一郎打出了「行政結構改革」的旗號，削減公務員人數，將郵政民營化。企業不斷擴大非正式員工人數以減少人工費用的支出。在這樣的眾多企業之中，吉田所在的公司就是減少正式員工的同時增加人均工作量的典型案例之一。

據國稅廳發佈的《民間工資實態統計調查》顯示，民間企業職工的年均收入在1997年達到峰值，為467

萬日元。然而，2014 年度該數據為 415 萬日元，2015 年度為 420 萬日元。也就是說，政府謳歌着「一億總活躍時代」，而實際市場規模是好不容易才買得起生活必需品。年輕人應該已經買不起房和車了吧。「再過幾年漲工資後就可以……」如果年輕人不再這樣夢想，他們又怎麼會消費呢？在我教書的幾所大學裡，學生不買教科書，包括我上的課的教科書，而是在圖書館借。他們已經沒有了購買生活必需品以外用品的習慣，這種情況隨處可見。

社會保障制度不改變，社會就無法正常運作。儘管如此，大人們卻在一邊小聲自言自語：「最近的年輕人真是內向、無所欲求，連車都不買，沒有去外面的世界冒險的勇氣。」(前首相麻生太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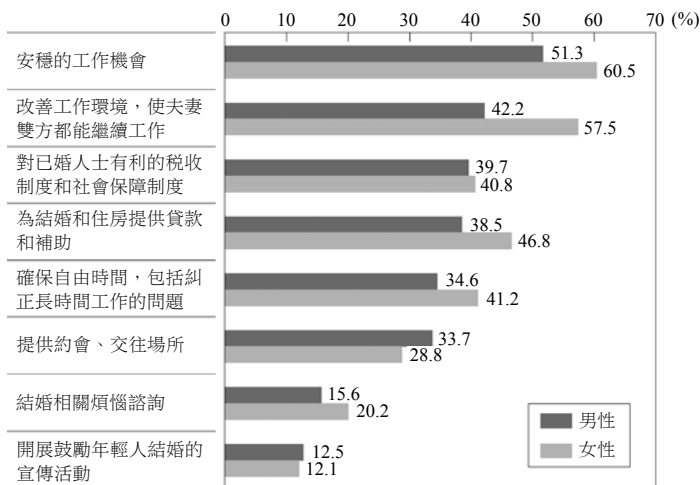
責備無法忍耐的自己

吉田不斷自責道：「我沒有忍住，也沒給公司作出貢獻。我為自己沒有忍耐住深感抱歉。」

「不，你並沒有錯。公司裡的前輩們也都沒有在那兒繼續工作，早點辭職對你來說是好事。」

我好不容易說服了他。吉田被「辭職後就活不下去了」的恐懼所折磨，幫他反洗腦花了很大功夫。我建議他接受最低生活保障，但他並不相信我。「我這麼年輕

圖表 1-5 希望結婚的男性和女性所期待的政策排第 1 位的都是「安穩的工作機會」



出處：2015 年厚生勞動省白皮書

怎麼可能接受最低生活保障呢？真的可以嗎？即使接受了也很愧疚。」於是我陪同他去相關政府機關申請最低生活保障。那天，他對每個人不停地道歉。

甚麼都不懂的職員 ——「您有可以依靠的家人麼？」

就這樣，我常常收到窮困潦倒的年輕人的求助，陪同他們去政府機關申請最低生活保障。NPO 法人全體每年會接到超過 5000 起求助。每次去申請最低生活保

障時，福祉事務所的職員總是異口同聲問道：

「您有可以依靠的家人麼？」

有可以依靠的家人的話，誰還來求助於我們呢？

伴隨着日本國家經濟發展減緩，日本的家庭規模也縮小了。與過去的大家族不一樣，家中的長輩不再養育年輕一代。家庭收入每年都在減少，家人間相互扶助的功能達到了史無前例的低水平。第4章「老人的貧困」中也會詳細講述，年輕人的父母和祖父母為了自己的生活已經竭盡全力。

攻擊貧困的人理所當然地把「你沒父母嗎？」「滾回老家」之類的話掛在嘴邊。我想，這是因為他們對家庭的概念還停留在前近代時期，即家庭具有父母養育孩子、孩子長大後贍養老去的父母這種相互扶助的功能。然而，對於一個20多歲的成年人，家庭應該給予多大程度上的照顧，這個問題難道不需要被重新審視嗎？

在其他國家，一旦成年，即便是有血緣關係的家庭成員之間，也不會像日本人這樣緊密地相互扶助。只有夫妻之間，以及父母對未成年子女才有撫養的義務。孩子長大後，依靠政府和社會體制來保障其生活。有房租補貼制度等，着眼於「使人在社會上更易生存」「整頓工作的環境，使其更為舒適」。

而在日本，雖然有面向年輕人的志願制度，如公共